

邓小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郑云天

【摘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一直致力于建立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体现这一制度的优势。他认为，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首要标准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则是体现制度优势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表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其最终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研究邓小平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3)04-007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11&ZD067)；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HB2011QR57)。

【作者简介】 郑云天(1985—)，男，内蒙古赤峰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探索 and 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力求在与资本主义共存和竞争的时代中，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势。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始，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阐述了一系列关于制度优势的创新观点，不仅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因此分析邓小平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标准——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②，“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

这个重要的判断标准鲜明而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它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运动则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既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又要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并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贫穷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其次，它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解放

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从自身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邓小平看来并不是深奥的玄妙的理论,而是十分质朴的道理。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这样才能让人们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认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邓小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切实改善人民生活,把曾经作为教条和“本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崭新的高度,从本质上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本原则——共同富裕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分享,所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⑤它包含了深刻而全面的辩证思想。

一方面,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就要克服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这两种社会现象。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首先,邓小平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犯平均主义错误的教训。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⑥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马克思曾指出,两极分化是指资本家一极“财富的积累”,伴随着无产阶级一极“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⑦。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导致这个结果,则不仅会难以发挥出制度优势,而且最终也无法真正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⑧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普遍得到改善,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小康,实际上,共同富裕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洞口号,更不能幻想着实现共产主义以后再解决,而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直通过不懈努力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要体现出制度和方针政策的效果,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才能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始终。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⑨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决定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要坚持先富带动后富,把先富、后富和共富统一起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⑩而关于先富、后富与共富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共同致富从改革一开始就必须充分强调,而且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⑪。而“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首先沿海地区要率先加快发展、实现对外开放,通过发展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同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⑫具体来说,可以采取针对性政策,如“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⑬。由此先富和后富就被统一起来,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表现形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⑭“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事”^⑮。相比于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在发展中可以集中资源，举全国之力，实现团结和高效，避免出现很多国家冗繁拖沓、议而不决和低效涣散等情况。因此，邓小平一直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这一表现形式，并从党的领导、民主法治和安定团结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邓小平曾指出，党的领导本身就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⑧党的领导之所以成功，主要依靠的就是理想和纪律。“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⑨而“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⑩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只经过几年时间一座崭新的城市就在废墟中破土重生，各项生产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展开，被很多国外人士视为近代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迹。1998年抗洪抢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再次体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和局部服从整体、眼前服从长远的集体主义精神，江泽民曾指出，“这次抗洪胜利再一次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的业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⑪。2008年党和人民抗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以及灾后重建的成果进一步彰显了这一制度优势。《时代》周刊随即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汶川地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制度的认知，让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此次抗震救灾行动中得到最多赞誉的是政府迅速的反应和民间令人惊叹的救援力量。即使是曾经‘反华’的媒体和人士也不得不对中国此次的表现感到由衷的钦佩”^⑫。当代中国不论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盛事，还是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抑或抗击各种重特大自然灾害，“中国制度”都发挥出令世人赞叹的巨大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⑬。历史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第二，民主法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⑭。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社会主义团结高效的实质是专权独裁，与民主法制根本不相容。邓小平完全反对这种片面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在保持高效运作的同时，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至于西方人鼓吹的民主，邓小平则以“文革”的教训证明了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在中国行不通。忽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民主化只会造成更加落后的局面。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历史进程中，片面追求形式民主的结果不仅既实现不了真正意义的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一盘散沙、人心涣散的局面。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绝不会东施效颦地盲目模仿美国的‘三权分立’而遭受像今天白宫、国会山与法院之间的互相扯皮而阻碍发展那样的祸害。写到这，我想特别提一下，当今美国有些观察家倒羡慕中国在这方面的巨大优越性”^⑮。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很多创新和突破，如民主集中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就能促进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为“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⑯

第三，安定团结的大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⑰一方面，安定团结有利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发

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也能进一步巩固这种局面,因为“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⑨因此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巨大优势。

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目标——超越资本主义制度

在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有很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些观点都指向一个最终目标,即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必将超越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坚定地认为,“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⑩这促使他认识到社会主义要想超越资本主义就必须对其坚持包容、借鉴与超越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优势的体现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本质上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而摆脱落后贫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不能仅是名字好听,而是发展速度超过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坚持马列主义理想,过去我们靠这个理想打赢了战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但由于一些失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⑪但是要充分认识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⑫。到建党100年时,中国才能形成相对成熟的社会制度。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则“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⑬“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通过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同时也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创新,这样才能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层面的竞争中不断取得比较优势,从而不断夯实赶超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和信念。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积极利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来不断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给人类社会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⑮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首先就要“师夷长技”,借鉴资本主义制度几百年发展的经验与成果。然而在“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直是羁绊中国发展的桎梏。邓小平坚决主张摆脱这种错误的束缚,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⑯针对社会中的偏见,他谈到,“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引进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先进的工业设施时曾由衷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⑱。当乘坐新干线列车时,他感慨道:“很快,就像风一样快。”“就像推着咱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⑲但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外国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否则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因此他一直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与社会主义比重占优势相结合的原则,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和对中国发展有益的东西,“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

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⑧“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⑨。这充分说明作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不断汲取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成果,进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趋完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用实践证明其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一百多年前,罗素曾就中国的发展前景预测道,“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⑩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在不断印证着这些预测的科学性。超越资本主义是邓小平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追求。他一直坚信社会主义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疯狂追求,无法凭借自身消灭剥削和掠夺,无法彻底避免席卷世界的周期性经济、金融和社会危机,更不能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与正能量。正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⑪。

“21世纪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国内外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⑫。总的来看,邓小平有关制度优势的论述充分体现出他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决心。虽然在制度发展中曾出现过各种波折,但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探索必将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制约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通过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制度吸引力和感召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时,我们就可以放胆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⑬

注 释

①⑤⑧⑪⑬⑭⑮⑲⑳㉑㉒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1253、1324、1324、1343、1195、1327、1255、1158-1159、1343、1216页。

②⑬⑮⑲⑳㉑㉒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41-342、159、251-252、254-255、167-168、167-168页。

③④⑥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㉓㉔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28、10-11、255、172、277-278、111、144、240、257、372、379-380、383、37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744页。

⑱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⑳ Simon Elegant, "China: Roused by Disaster", Time, May 22, 200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808638,00.html>)。

㉑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㉒ [印]谭中:《认清中国“文明大国”模式,发扬中国文明内功》,载于吴敬琏、俞可平、[美]罗伯特·福格尔等编:《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㉓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㉔⑳ 潘敬国:《共和国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107-108页。

④⑩ [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④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④② 宋才发、万仁德:《邓小平理论是21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